

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研究：内涵、机制与影响^{*}

王 戎 李志博

〔内容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国内经济和国际地位都在稳步提升,但以色列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却悲观地认为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具体表现为巴以和谈无望、周边环境恶化、伊朗威胁加剧以及深陷国际孤立。在此背景下,受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以色列形成了以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为基础、支持右翼政党执政以及拥护强硬国家安全政策为核心的“右翼安全共识”。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再次得到体现,其强硬的安全观主导着战争整体走势,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右翼安全共识”虽为以色列提供了短期安全保障,但其长期影响却不容乐观,反噬作用将消耗以色列的国家资源与战略空间,不利于国家的正常发展和地区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 以色列 “右翼安全共识” 安全 犹太复国主义 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 王戎,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李志博,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讲师

〔中图分类号〕D7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3-0086-24

在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背景下,多个处在东西方间裂隙地带的国家陷入内乱或发展困境,各国国内右翼思潮影响不断扩大。在中东地区,这一趋势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加速发展,而以色列则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一方面,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色列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外部资源支持下持续提升,与周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党和民众的右翼倾向愈发显著,在安全问题上形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项目编号:2024-SKJJ-C-085)“大变局下中东海上通道安全与大国军事战略选择研究”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CGJ036)的阶段性成果。

“右翼共识”。继俄乌冲突之后,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再次印证了东西方裂隙地带的历史动态。以色列对外界威胁的敏锐感知和对强硬军事手段的选择偏好,使中东安全局势不断恶化。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一) 问题缘起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源于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建国地点、方式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该运动内部形成诸多派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尤为突出。1948年建国后,以色列人针对安全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呈现出左翼和右翼两条路线的分化。^① 20世纪50年代,摩西·夏里特和本-古里安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初步体现出以色列政治生态中左右翼力量的对立:前者态度更为温和,主张通过谈判推进“两国方案”;后者虽为左翼政党党魁,但对巴勒斯坦人态度强硬,提倡主动防御。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关于如何处理“被占领土”,^②以色列人展开激烈论战,左翼与右翼力量间对抗加剧。

然而,自2000年以后,以色列人对安全问题的看法开始从分歧走向共识,尤其在安全威胁认知、地区形势判断和国家政策选择上,在集体层面体现出日益强烈的右翼化倾向。在政党政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对安全形势的感知与对安全问题的认知上升为以色列的全民安全观和政治正确话语,形成具有较大群众基础的“右翼安全共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教授泽夫·马奥兹认为,以色列人关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许多基本假定高度一致,拥有宗教般的力量,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③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得

① 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 Setting, Images,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3.

② 被占领土是国内学界采用阿拉伯人视角对“Israel-occupied territories”的通常译法,严格意义上是“以色列占领领土”,即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目前主要指约旦河西岸。

③ Zeev Maoz, *Defending the Holy Land*,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p. x.

到进一步强化。以色列为何在整体国力和地区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形成“右翼安全共识”并偏好强硬军事手段？这一共识的形成，是否仅归咎于内塔尼亚胡或利库德集团等单一因素？这些疑问值得深入探究。

（二）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以色列选举制度、右翼政党、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阿拉伯人等议题开展的研究，部分解释了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形成的原因。国内学者中，冯基华指出，以色列的苦难历史、独特宗教文化以及现实矛盾冲突是形成右翼思潮的根源；^①陈双庆将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的根源归为“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②张俊华从人口政治学角度解释了以色列“右转”现象；^③吴诗尧探讨了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在重塑以色列内政外交政策中的作用。^④国外学者中，埃兰·卡普兰提出，利库德集团等右翼政党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和发展是以色列形成极右翼思想的主要原因；^⑤艾米·珀达祖尔从极端右翼政党的视角出发，分析其如何通过法律等制度性手段强化以色列极右翼思想的影响力；^⑥丹尼尔·海勒追溯雅博廷斯基的思想，认为以色列右翼化的根源是受雅博廷斯基影响的波兰犹太青年团体推动所致；^⑦埃胡德·斯普林扎克分析了定居点运动中的右翼政党因素；^⑧塔玛尔·米茨认为以色列媒体在传播右翼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⑨约翰·米尔斯海默等人则认为，以色列借助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从而获得以强硬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外部支持。^⑩

① 冯基华：《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西亚非洲》2008 年第 10 期，第 36～40 页。

② 陈双庆：《以色列政治生态右倾与中东局势》，《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3 期，第 43～47 页。

③ 张俊华：《以色列“向右转”的人口政治学考察》，《国际观察》2018 年第 3 期，第 128～141 页。

④ 吴诗尧：《以色列犹太极端民族主义与巴以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8 期，第 43 页。

⑤ Eran Kaplan, *The Jewish Radical Right: Revisionist Zionism and its Ideological Legacy*,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 161.

⑥ Ami Pedazur, *The Triumph of Israel's Radical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5.

⑦ Daniel Kupfert Heller, *Jabotinsky's Children: Polish Jews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Zioni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7.

⑧ Ehud Sprinzak, *The Ascendancy of Israel's Radical 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

⑨ Tamar Mitts, "Terrorism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Content in Israeli Boo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1, 2019, pp. 203～224.

⑩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传兴译：《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国内外现有研究大多从特定视角研究以色列右倾现象,过于强调特定人物、政党、安全形势、意识形态等单一因素的重要性,缺少采用全局视角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对犹太民族心理的分析。针对这些不足,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从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的内涵和表现出发,尝试建立一个全面囊括内外因素的分析框架,厘清产生“右翼安全共识”的因果机制,并评估这一共识对以色列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以期加深学界对以色列内部问题和巴以局势的理解。

二、“右翼安全共识”的内涵和表现

(一)“右翼安全共识”的内涵

在以色列的语境中,虽然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是以色列政治的核心议题,但在2000年以前、尤其是1977年以前工党执政时期,“左”和“右”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含义。随着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长期占领和巴以冲突的持续,“左”和“右”的安全色彩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含义逐渐淡化。对安全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对巴以问题的态度,成为区分左右翼的主要标准。简言之,“左”追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右”主张通过强硬手段追求安全。后者被以色列政治精英和民众普遍认可,成为“右翼安全共识”最基本的含义。为深入分析其内涵,下文从“右翼安全观”和“右翼安全共识”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1. 右翼安全观

以色列右翼安全观根植于高度倚重军事手段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安全观。由于安全问题是右翼力量的核心关切,右翼极端主义可视为右翼安全观的上位概念。荷兰政治科学家卡斯·穆德在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右翼极端主义时,归纳出右翼意识形态的三个核心要素,分别为本土主义、权威主义和民粹主义。^①对照这一分析框架,可提炼出以色列右翼安全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特点。

^①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

在本土主义方面,以色列右翼安全观以犹太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优先考虑犹太人的安全。以色列右翼安全观具有强烈的族群民族主义特点和排他性,不但对阿拉伯人等外群体高度不信任,还倾向于夸大其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二是认为土地即安全。以色列右翼安全观基于犹太教传统,将民族与土地强行联系起来,强调以色列犹太人拥有追求“大以色列”的绝对权利,通过修建定居点来实现对约旦河西岸的长期占领,从而建立“可防御边界”。三是高度关注内外群体人口比例。鉴于犹太性和民主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人口比例成为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以色列成功建国的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持续的移民活动改变巴勒斯坦地区人口比例。建国后,以色列不断提高犹太人出生率、鼓励海外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以及通过各种手段减少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在权威主义方面,以色列右翼安全观的特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安全机构的权威。国防军、辛贝特和摩萨德等与安全相关的机构被赋予极高的声望和权威。相比之下,法院等机构的权力空间遭到挤压。二是强调政治强人的权威。右翼安全观主张由政治强人带领国家应对内外挑战。作为政治强人代表,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长期执政,个人权力不断扩大。三是强调宗教的权威。一方面,右翼力量借助天然具有右翼倾向并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的宗教力量来增强自身合法性。另一方面,以色列宗教力量不再自我定位为民族精神引导者,对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不断提高。极端正统教派政党与利库德集团因此形成稳定的同盟关系,使右翼安全观具有日益强烈的宗教民族主义色彩。^①

在民粹主义方面,在右翼势力操纵下,持右翼安全观的力量试图制造“人民意志”,与“左翼精英”对立。以东方犹太人为主的非精英群体普遍持民粹主义世界观,认为以色列媒体、公民社会、大学和司法系统被缺少爱国主义情怀的左翼知识分子精英控制。在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以色列右翼政府与欧洲极右翼政府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形成共鸣,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右翼

^① 黄杰、张婧:《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4 年第 7 期,第 112~133 页。

政党的反精英立场及其国际影响力。民粹主义原本是一种力量强大但内涵稀薄的意识形态,但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将其与安全问题相结合,基本假设为: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只有强硬的右翼政党能够代表广大民众利益、保卫以色列安全并捍卫其犹太属性,软弱的左翼力量则为国家和民族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看,右翼安全观不仅是一种针对外群体的强硬安全观,也是一种作用于内群体、由安全问题驱动的民粹主义安全观。

需要指出的是,右翼安全观与工党主导时期的“冷峻现实主义”安全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对其继承与改造。在继承方面,右翼安全观同样重视追求防御纵深、战略威慑与绝对安全。在差异性方面,其一,右翼安全观更加依赖单边军事手段和“可防御边界”,相较于左翼安全观主导时期,1967 年对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以色列拥有更多的使用单边军事手段的优势地位以及追求“可防御边界”的条件,为右翼安全观提供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其二,在威胁感知上,左翼安全观对威胁的判断更加真实和可验证,右翼安全观则更为主观,存在将非安全问题进行“安全化”处理的倾向;其三,在对待和平态度上,左翼安全观主张为实现和平作出妥协、包含更长远的战略考量,右翼安全观对和平的态度更为悲观、更关注当下、妥协的空间更小。此外,不同于工党时期的安全观,右翼安全观还具有更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非民主性、宗教性和民粹主义等特点。

上述分析表明,单纯从民族主义视角审视右翼安全观有一定片面性,容易忽视犹太人内部左右翼力量间具有隐蔽性的政治动态。从民粹主义的视角看,以色列右翼观与其他国家右翼观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安全问题而非经济、文化或社会问题,是以色列右翼民粹主义核心驱动力来源。事实上,右翼安全观在传统修正复国主义安全观的基础上融入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领土最大化思想,可视为新修正犹太复国主义安全观。

2. 右翼安全共识

右翼安全观常表现为个体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当个人层面的右翼安全观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内化为群体性认知时,便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共同认知基础和社会凝聚力的群体性安全观,即“右翼安全共识”。

尽管以色列社会高度多元,极难达成共识,但在安全问题上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前文所述的以色列右翼安全观萌芽于 20 世纪初,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和利库德集团上台而变得日益主流,最终于 21 世纪初在以色列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所谓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是以色列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在安全问题上形成的具有右翼特点的主导性认识。这一共识并非基于田野调查或定量研究,而是基于学理分析和感性认识。由于右翼思想是右翼安全观的上位概念,我们可以进而推论以色列存在“右翼共识”。然而,在以色列长期存在大量反对右翼政府、持左翼观念的个体。因此,要使这个概念逻辑自洽,必须解释左翼力量与“右翼共识”之间的关系:第一,很多左翼人士实际接受了右翼安全观。左翼和右翼是两种竞争性政治标签或话语体系,“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严格意义上只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宣示或最高理想的表达,并不完全代表安全问题上的真实意图。第二,在以色列的民主体制下,右翼政党的权力来自选举程序,拥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色列右翼化趋势并非以色列国防军等所谓的理性力量对少数非理性的右翼势力的妥协,而是社会民意结构性变化的结果。第三,“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也是以右翼政党为核心的施动者利用民粹主义对民众安全观操纵和控制的结果,后文将对这一点展开论述。

综上,“右翼安全共识”指以色列社会在安全议题上形成的一种以新修正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主导性认知框架,在思想和心理层面包含悲观的形势认知和安全感知,在行动层面包含对右翼政府及强硬安全政策的支持倾向。因此,这种安全观具有意识形态特点和极强的社会建构性,直接作用于以色列的社会现实和政策实施。“右翼安全共识”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以色列右翼政策的根本逻辑和社会基础。

(二)“右翼安全共识”的外在表现

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在政治、社会和政策等维度得以体现:

第一,持右翼安全观的右翼政党在选民的支持下长期执政。根据以色列的比例代表选举制,政党根据票数比例获得 120 个议席中的相应议席,得票最多的

政党拥有组阁权,党魁成为新政府总理。^①从选举结果看,从2003年第16届议会选举到2022年第25届议会选举,右翼政党长期获得最多票数;从选民结构看,青年一代更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体现出全国人口的右翼化趋势;从实际组阁情况看,与右翼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是长期同样持右翼立场并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的宗教政党。由图1可见,宗教政党的席位高度稳定;从政治领导人看,从2001年到2024年,以色列几乎全部总理和大部分关键部长都来自右翼政党。2022年大选后,来自极右翼政党的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分别担任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与此相对,建国以来长期主政的左翼政党不断衰落。从1977年到2000年,以色列工党尚能与利库德集团交替执政。但2000年以来,左翼政党的得票率持续走低,工党和梅雷兹党长期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对右翼政党的制衡作用明显减弱,提出的推进和平进程等议题不断被边缘化。同时,随着中间派政党的兴起,大量持左翼观点的选民将选票投给民族团结党等中间派政党,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第二,民众抗议活动和民意调查体现“右翼安全共识”的主导地位。2000年以来,以色列社会针对国家军事行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大多针对社会问题而非安全问题。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的抗议活动,民众诉求主要是催促政府达成释放人质协议,而非呼吁停战或加强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民意调查结果方面,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自1983年起每年定期发布《国家安全指数——民意调查研究》,反映以色列公众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看法。在2001年以前,该报告中很少出现“伊朗”一词,但之后,以色列民众对恐怖主义威胁和伊朗威胁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对巴以和平问题的关注度则持续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以色列可与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以色列人比例从2013年的50%下降到2017年的44%,2023年进一步下降到35%(见图2)。^②以色列国家安全所2024年3月到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39%的以色列受访者认

① 闫瑞松:《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29~30页。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Israelis have Grown More Skeptical of a Two-State Solution,” September 26,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9/26/israelis-have-grown-more-skeptical-of-a-two-state-solution>.

为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合理的,34%认为军事行动的规模不足,仅 19% 认为以色列存在过度防卫倾向。^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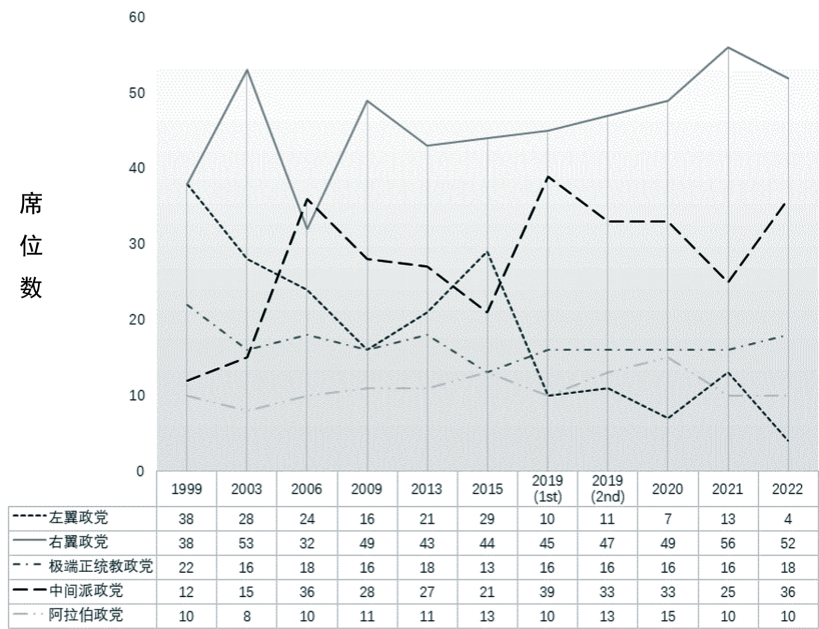


图 1 1999 年到 2022 年以色列各类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席位情况

资料来源:以色列政府网。

第三,极具进攻性的右翼政策进一步凸显“右翼安全共识”主导地位。为维持执政联盟,利库德集团向立场更右翼的政党妥协,使国家政策不断朝右翼化方向发展。在治理方面,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推进定居点建设。从 1967 年到 2023 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建立了 200 多个定居点,定居者超过 70 万人,约占以色列犹太人口总数的 10%,^②增长率远超全国人口增长率。除了定居点建设,内塔尼亚胡政府长期反对“两国方案”,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Israeli Views of the Israel-Hamas War,” May 30,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4/05/30/israeli-views-of-the-israel-hamas-war>.

② “Who are Israeli Settlers, and Why Do They Live on Palestinian Lands?” AL Jazeera,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1/6/who-are-israeli-settlers-and-why-do-they-live-on-palestinian-lands>.

这一立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变得更明晰。2024 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声称“巴勒斯坦建国将给以色列带来生存性威胁”,公开拒绝“两国方案”。在军事方面,2006 年以色列国防军形成“达希亚”原则,即通过大规模摧毁敌方基础设施以实现报复和威慑目的。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明显具有报复性,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系统以提高目标打击效率。2024 年 8 月以来,以军暗杀周边非国家行为体多名领导人,在黎巴嫩南部开展有限地面行动,还在阿萨德政府倒台后加大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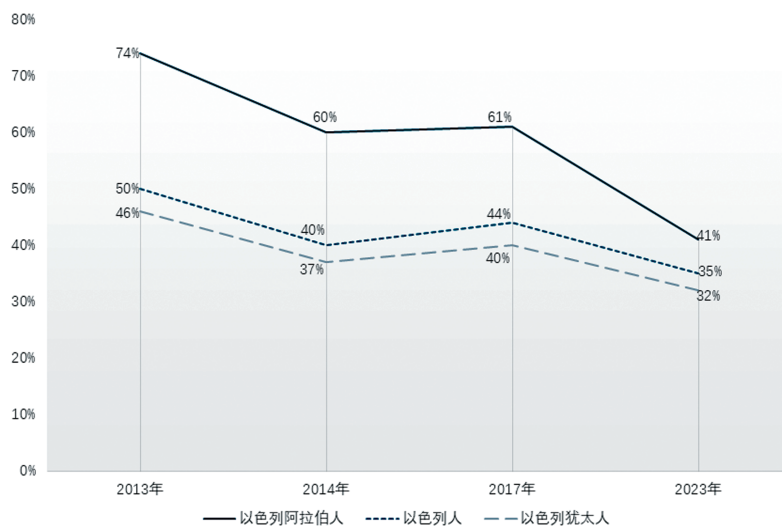


图2 2013 年到 2023 年认可“两国方案”可行性的以色列人比例变化图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9/26/israelis-have-grown-more-skeptical-of-a-two-state-solution/>。

三、“右翼安全共识”形成的外部因素及其解释性不足问题

(一) 形成“右翼安全共识”的外部因素

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拥有客观事实基础。从以色列的视角分析,在建国初期,以色列真实面临生存性威胁,而进入 21 世纪后,导致“右翼安全共识”形成的外部安全因素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以色列人在各层次得出的“结

论”则构成“右翼安全共识”中的形势认知和安全感知。

第一,在被占领土层面,世纪之交相继发生了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断、2000 年戴维营谈判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及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间歇性恐怖袭击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以土地换和平”理念的失败,由此产生的幻灭感让以色列人认为左翼人士的安全主张严重偏离现实。由此,以色列人得出的“结论”为:外溢自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国家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通过谈判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基于这些“结论”,许多左翼政治家和民众在后奥斯陆时代转向中间派或右翼阵营。

第二,在周边层面,2000 年以来安全威胁的变化对以色列人的安全感造成较大冲击。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加强在以色列周边的军力部署,并大量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手段对以施袭,使以色列面临的威胁类型发生改变,国土安全遭遇严峻挑战。在南部,以色列 2005 年从加沙地带单边撤离后并没有获得和平,哈马斯巩固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并动辄对以色列发动火箭弹袭击。2023 年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再次暴露以色列在安全上的脆弱性。在北部,2006 年 7 月,真主党武装分子突然越境发动袭击,在随后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展现出较强作战能力,造成以色列国防军大量人员伤亡。以色列在军事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长期无法对非国家行为体取得“决定性胜利”。由此以色列人得出的“结论”为:与周边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具有必然性,以色列只能通过“割草”行动换取有限的平静期。

第三,在地区层面,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安全关切。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失去了来自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制衡。伊朗在绝对实力上远超以色列的传统对手,且尝试追求核武器能力。伊朗领导人“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给以色列人造成巨大心理冲击,加剧了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伊朗还通过“抵抗轴心”整合地区反以力量,不断发展和输出非对称军事能力,支持真主党、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从多个方向对以施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与伊朗打破了之前“斗而不破”的竞争模式,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伊朗于 2024 年 4

月和10月对以色列境内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导弹袭击。基于此,以色列人得出的“结论”为:伊朗对以色列而言构成生存威胁。

第四,在国际层面,世界范围内客观存在的反以情绪和反犹行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针对以色列合法性和人权问题的诸多提案,也给以色列人造成严重的孤立感。美以关系在奥巴马时期出现的波折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孤立感。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随着加沙地带平民伤亡人数的上升,以色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美以也出现严重分歧。由此,以色列人得出“结论”:以色列深陷国际舆论和外交围攻中。

被占领土、周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外部因素共同带来的结果是,以色列领导人和民众产生了反恐任务紧迫、巴以和谈无望、伊朗威胁严重、国际反以力量强大的形势认知,进而产生“以色列处在围困中、国家和民族生存堪忧”的悲观安全感知。根据建构主义的结构观,前者是以色列人的“共有知识”,属于认知范畴;后者是以色列人的“共有观念”,属于感知范畴。^①在形势认知和安全感知的共同作用下,以色列人期待强硬政党和强人执政,认为右翼政府能带来更多安全感和实际利益。如此,强调领土最大化和建筑“铁墙”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获得空前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形成了右翼国家安全战略、强硬的单边外交政策、定居点政策和特殊对待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国内政策。

(二) 外部因素解释力的不足

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虽得到外部因素的支撑,但若仅从这个角度考虑,不但难以触及事物本质,还可能被局限在以色列的话语体系中。在外部因素影响下,民意的确会在冲突加剧时形成右翼立场,土耳其经历库尔德工人党袭击以及美国经历“9·11”事件后,国内民意就出现过类似动态,但在形势缓和时必然向左“均值回归”,难以形成稳定的“右翼安全共识”。实际上,“右翼安全共识”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不断被安全问题“激活”和“放大”,并非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呈现。集体意向创造意义,进而形成了主体间共识,并能够对包括决策者和普

^①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页。

通民众在内的主体产生约束力。^① 形势认知和安全感知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是由以色列人在安全问题上的悲观情绪和特定价值观塑造的社会事实。具体来说,以下几点可反映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与物质事实之间存在明显偏差:

第一,在和平进程方面,以色列长期缺少落实“两国方案”的诚意。在工党执政时期,以色列务实参与和平进程,注重外交手段的运用。但 2000 年以来,以色列参与的各种谈判,颇有迫于美国施压向国际社会作秀之嫌,缺少实际解决问题的意愿。与此同时,以色列通过经济、政治、安全和司法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使双方形成不对称依赖。在经济上,巴勒斯坦水电等基础物资完全由以色列提供;根据 1994 年签署的《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负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税,并对在以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些税款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行政开支的主要来源,而暂停向巴方移交代收税款则是以色列对巴方的常用“惩罚”措施。在安全上,以色列人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自由通过绿线,但巴勒斯坦人缺少行动自由,自治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被以军严格控制;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只设置安全部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以色列就利用军事司法体系加大对巴勒斯坦人的逮捕和审判力度,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以色列监狱系统中关押了 5200 名巴勒斯坦人,而 2024 年 6 月底人数增至 9440 人。^②

第二,在周边威胁方面,以色列与敌方在军事能力上高度不对称。2000 年以来,以色列经历的大多数冲突中,双方的实力极不对等,伤亡对比悬殊,以色列并未面临生存性威胁。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造成 972 名以色列公民死亡,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为 3315 人。^③ 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平民死亡 43 人,军人死亡 119 人,而根据联合国黎巴嫩调查委员会报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共造成 1100 多名黎巴嫩人死亡,超过 4400 人受伤。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截至 2025 年

① [法]E. 迪尔凯姆著,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34 页。

② “Statistics on Palestinians in Israeli Custody,” September 2, 2024, https://www.btselem.org/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

③ “Intifada Toll Sep 2000 - Sep 2005”, BBC, February 8, 2005,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694350.stm.

5月,以色列在战争中死亡近1800多人,加沙地带死亡人数则超过4.6万人,另有近12万人受伤。^①

第三,在伊朗威胁方面,以色列的解读方式高度单一,缺少灵活性和辩证性。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外交政策的确有一定的扩张主义倾向。进入新世纪,伊朗不断在以色列周边建构具有打击能力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火力圈”,^②客观加剧了中东的军备竞赛。但伊朗提升自身军事实力,主要目的是维系政权稳定,践行“前沿防御”战略。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后,伊朗明显存在避免冲突升级的倾向,在2024年10月26日遭受以色列袭击后主动结束了与以色列的“回合制”互袭。对伊朗意图的解读决定了以色列的应对方式。除了发动“影子”战争和“战争间战役”行动,以色列客观上还拥有其他政策选项,但由于这些选项违背了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因此根据认知相符原则被“认知过滤”,难以产生实质影响。

第四,在国际体系中,“右翼安全共识”对以色列国际环境的认知与其实际情况高度错位。2000年以来,以色列已非一个被强敌环绕、生存堪忧的小国,而是一个被公认拥有核武器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地区军事强国。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质量型军事优势”,为以色列推行右翼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撑。如图3所示,以色列建国以来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31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美国对埃及、阿富汗、南越和乌克兰的援助。^③ 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以色列经济保持稳健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36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5099亿美元。^④ 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的斡旋下,《埃以和约》《约以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先后签署,客观上使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① INSS, “Swords of Iron - Real Time Tracker,”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war-data>.

② Yaakov Amidror, “Iran’s Ring of Fire,” <https://jiss.org.il/en/amidror-irans-ring-of-fire/>.

③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U. S. Aid to Israel in Four Charts,” <https://www.cfr.org/article/us-aid-israel-four-charts>.

④ IMF, “Israel: Datasets,”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rofile/IS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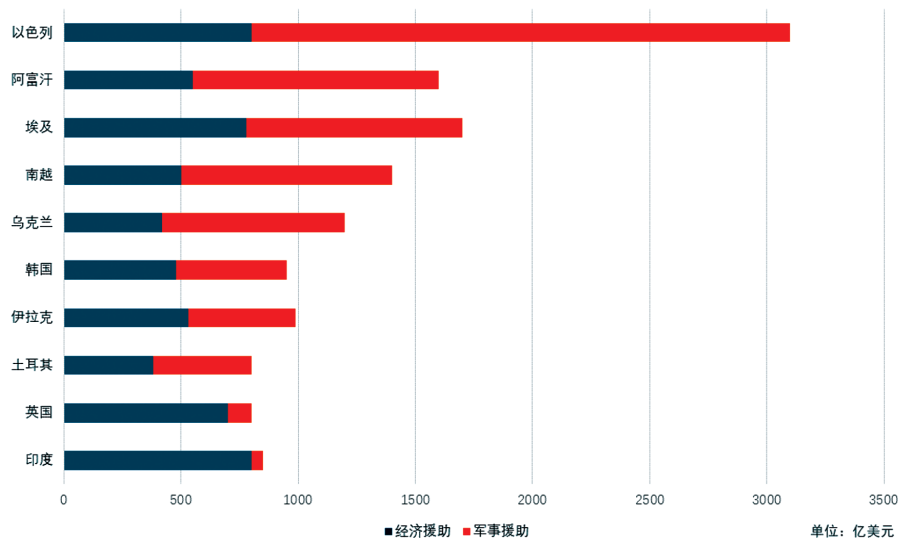


图 3 1946 年至 2024 年各国接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总量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https://www.cfr.org/article/us-aid-israel-four-charts>。

整体上看,从 2000 年以来,以色列的战略环境不但无恶化趋势,还有所改善。然而,上述事实不仅未促使以色列调整右翼政策,反而成为右翼政策有效性的佐证,进一步强化了“右翼安全共识”的“合理性”,巩固了右翼政党的执政基础。总之,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难以以“外部威胁”为由充分解释。

四、形成“右翼安全共识”的内部因素

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外部刺激是导致行为体政策选择的自变量,而内部因素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变量。^① 为了深层理解“右翼安全共识”与右翼政策这些因变量的形成,还须考虑以下四个发挥干预和传导作用的内部因素。

(一) 历史文化因素

以色列的认知、感知和共识不是凭空建构的,而是需要依托业已存在的认知结构,主要包括犹太人基于犹太教形成的例外主义传统、反犹主义造成的极度不

^①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 页。

安全感,以及极具军国主义特点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例外主义传统主要源于犹太教中的选民观念,常外现为犹太人的优越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犹太人相信强大的超现实力量支配着犹太民族的命运,对形而下的现实世界缺乏信任。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倾向于利用宗教话语来强化右翼政策的合理性。例外主义传统在安全方面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以色列人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不信任和二元对立认知,易导致其高估外部世界的敌意,进而采取强硬安全措施,导致冲突在安全困境中螺旋上升;将自身安全绝对化,忽略对方的安全需求,不利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易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产生“免疫”乃至采取对抗姿态。

长期的“大流散”导致犹太人缺乏安全感,形成“岛民心态”。大屠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使之成为以色列人的集体无意识。这些经历成为以色列人在进行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时的“历史包袱”。建国后,面对长期战乱和冲突,犹太人极具防范意识和排他性,认为自己注定成为“孤独的民”,具有强烈的受害者心理特征。战略纵深和人口不足的事实进一步加剧此种不安全感,使以色列人认为国家经受不起任何失败。这种认知失衡经常引发过度反应,表现为对绝对安全的偏执追求。因此,以色列人认为改变国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占领更多领土作为缓冲地带等措施,是缓解这种不安全感的有效方式。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安全思想源于泽夫·雅博廷斯 20 世纪初提出的“铁墙理论”,强调阿以冲突的零和博弈本质,主张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建立绝对军事优势,通过频繁的压倒性胜利迫使后者承认犹太国。这些思想对贝京等政治家的影响极大,成为以色列右翼政党的重要思想渊源。建国后,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中作为战略支柱的“威慑”和“决定性胜利”,本质上就是对“铁墙”理论的继承。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利库德集团的上台,修正复国主义思想逐渐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力不断提高。此外,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随着犹太宗教人士政治参与度的上升,新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形成,强调用弥赛亚思想和土地救赎理论强化定居点运动的合法性。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与新犹太复国主义从“安全”和“情感”两个维度在右翼安全观上形成合力。这些长期存在的历史文化

因素既是以色列形成“右翼安全共识”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以色列战略文化的底色和民族叙事的基础。

上述历史文化因素深刻影响了犹太人对安全问题的感知,这种影响并非 21 世纪出现的新现象,而是可追溯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也常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毕竟,在 19 世纪末,全球犹太社团高度异质,缺少共同领土、共同口语等现代民族的认同标志,而对犹太教的认同、在反犹主义运动中的受害者心态以及长期流散产生的不安全感,成为全球犹太人少有的共同特征,因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展政治动员、构建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一策略得到以色列右翼政党的继承。

(二) 政党政治因素

以色列右翼安全观的民粹主义属性,有助于分析以色列右翼政党的统治策略。作为民粹主义色彩日益强烈的右翼政党,为维持统治地位,利库德集团充分利用民众因长期冲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情况下以东方犹太人的不满情绪,将自己标榜为全民保护者和底层民众代言人,让左翼人士充当以色列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具体到安全问题上,右翼政党整合意识形态资源,用于强调外部威胁,制造安全焦虑,加强以安全为核心的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主导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促进国内形成符合右翼政党价值取向的共识,创造能够巩固和延续其统治的选民基础。对统治阶级而言,以色列最大的隐患在于内部出现民族、族群、宗教、意识形态等维度的分裂,而非外部威胁。这种分裂会急剧加大统治者进行国家整合和民众动员的难度。以色列 5 年内举行 4 次大选以及 2023 年司法改革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已充分暴露出政治和社会裂痕。在此形势下,利用外部威胁和民族主义情绪,是避免内部分裂加剧、维持政治稳定的最优方案。为此,利库德集团以及与其长期组成执政联盟的其他右翼和宗教政党,几乎垄断了安全问题上的议程设置权,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塑造“右翼安全共识”。“右翼安全共识”一旦形成,以色列右翼政党只有向更右的方向偏转,才可获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维持执政地位。这样一来,政党和民众在“右翼安全共识”上相互“赋能”,

形成恶性循环。为获得民众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利库德集团缺少转圜余地。

(三) 舆论场域因素

“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离不开舆论场域的构建。政治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国家官僚机构、军队、媒体和教育体系等关键施动者通过建构舆论场域维持和强化“右翼安全共识”在以色列的主导地位,并塑造出符合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叙事。这些关键施动者本质上是在以色列大量吸收和消耗资源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整体上看,维持这种话语符合施动者利益,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在教育体系中,以色列犹太教育体系与阿拉伯教育体系相互分离,这进一步强化了犹太“我者”与阿拉伯“他者”之间的差异,而犹太教育体系与右翼政党的立场高度相符。^① 例如,由以色列退役军人发起的专门收集以色列违法军事行为的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组织”以及根据新解密档案反思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驱逐阿拉伯人行为的新历史学家,在以色列教育体系受到强力抵制;专门揭露左翼“反以”学者的右翼组织伊姆特祖在教育体系的影响力则不断扩大。20 世纪末,随着《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以色列的教材体系出现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特点,但在 2009 年以来,尤其是在右翼政治家吉德翁·萨尔和纳夫塔利·贝内特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以色列义务教育的教材体系愈发具有宗教民族主义特点。^② 犹太人虽然有较强的求异思维倾向、反思精神和辩论习惯,但根据传播学当中的两级传播论,信息并非直接通过大众传媒传达至受众,而是首先从大众传媒传播到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传达至社会公众。^③

以色列国防军等国家机构、政治精英、“被高度信任”的公众人物以及右翼媒体(如《今日以色列报》)作为意见领袖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塑造了结构稳定的主流舆论,在这种主流舆论引导下,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 C 区修建定居点

① Ayman K. Agbaria, “The ‘Right’ Education in Israel: Segregation, Religious Ethnonationalism, and Depoliticized Professionalism.”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59, No. 1, 2018, pp. 18 ~ 34.

② Halleli Pinson, “Neo Zionis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 and Activism in the Israel Education System,”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Vol. 20, No. 2, 2022, pp. 124 ~ 137.

③ Paul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xxii.

被视为合法行为,而违背“右翼安全共识”观点的行为却常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持亲巴立场的犹太人也常遭舆论的攻击和诋毁。2000 年戴维营谈判失败后,以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创造了巴勒斯坦“没有对话者”的政治话语,极大降低了民众对和平的预期。以色列知识分子精英还选择性地追溯历史,总结出五次巴勒斯坦人主动放弃的建国“机遇”,^①将和平进程的停滞完全归咎于巴方。

(四) 人口结构因素

以色列右翼共识的兴起与其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东方犹太人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使政治偏好由工党转向利库德集团,成为右翼政党最重要的选民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宗教群体和俄裔移民数量的不断提升,使右翼政党获得了更稳定的“人口基本盘”,加速了“右翼安全共识”主导地位的形成。

2015 年,以色列前总统鲁文·里夫林在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会议上提出,以色列呈现出“四部落”的人口发展趋势,“四个部落”分别为世俗犹太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极端正统教派以及以色列阿拉伯人。从幼升小的比例看,原本为主体的世俗犹太人仅占当年入学人数的 38%,而宗教复国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教派的年轻人口比例则迅速上升。^② 由于世俗犹太人的出生率远低于后三者,这一趋势在 10 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明显。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显而易见:传统上支持左翼的世俗犹太人(尤其是阿什肯纳兹人)因人口比例下降而在政治舞台上的力量不断减弱,而宗教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阵营则因人口基数增加而持续壮大。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大量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同样加快了以色列人口的右翼转向。俄裔犹太移民和犹太宗教人士都具有较强的右翼倾向:前者深受俄罗斯民族战斗精神和权威主义的影响,阿维格多·利伯曼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

① 五次历史“机遇”分别为 1937 年皮尔调查团报告、1947 年联合国分治决议、1967 年以色列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换取和平的提议、2000 年戴维营谈判中埃胡德·巴拉克的和平提议以及 2008 年埃胡德·奥尔默特的和平提议。

② Ksenia Svetlova, “The Four Tribes of Modern Israel,” The Jerusalem Strategic Tribune, June, 2023, <https://jstribune.com/svetlova-the-four-tribes-of-modern-israel/>.

人物和重要领袖,后者包括极端正统教徒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基于宗教经典他们深信“犹地亚与撒马利亚”(即约旦河西岸)是上帝给犹太人应许之地。这两个群体为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复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口基础,巩固了沙斯党、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和以色列家园党等右翼政党的选民基础,造就和维持着“右翼安全共识”在以色列的霸权地位。此外,由于右翼政策关系到一些追求更低生活成本的定居者的根本利益,他们也成为右翼政党的重要选票来源。

综上所述,“右翼安全共识”的形成不是特定新变量造成的短期现象,而是诸多变量动能累积的产物,具有深层性和持久性。如图4所示,在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下,犹太人普遍产生了相似的形势认知与安全感知。他们认为,相对于追求和平的左翼,右翼政府及其强硬政策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安全感。在内部因素中,政党政治和舆论场域具有较强的人为性,增强了精英凝聚力,促成精英共识的形成。历史文化因素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人为性相对较弱,增强了社会整体凝聚力,促成社会共识的形成。精英共识与社会共识相互促进,共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的内部一致性。^① 内外因素共同构成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的生成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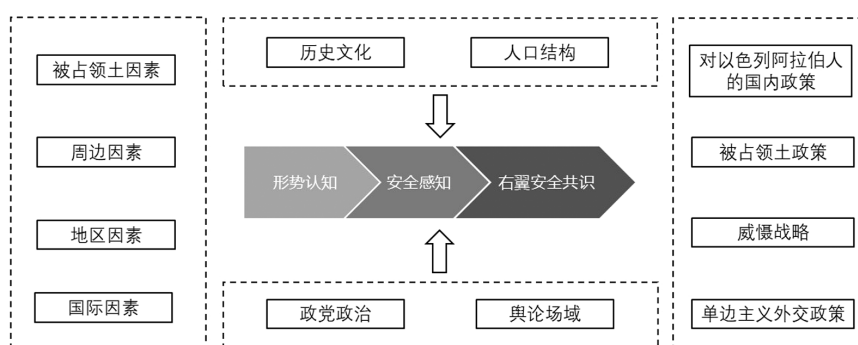


图4 “右翼安全共识”的内外因素逻辑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 168.

五、“右翼安全共识”的影响

“右翼安全共识”最直接的产物是形成了包括强硬军事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右翼政策。短期看,“右翼安全共识”的确给以色列带来了实际收益:国内层面,“右翼安全共识”增强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例如修建隔离墙和对约旦河西岸高强度管控等“右翼安全共识”催生的政策,客观上降低了以色列国内遭受恐怖袭击的频率。在地区层面,极具进攻性的“战争间战役”行动和“割草”战略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形成了一定威慑,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重创“抵抗轴心”,2024 年 11 月《黎以停火协议》和 2025 年 1 月《加沙停火协议》的签订,表明以色列基本重建对敌威慑。国际层面,在以色列的呼吁下,伊朗核问题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多领域开展合作。但长远看,“右翼安全共识”不利于以色列的正常发展和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

第一,“右翼安全共识”会降低以色列政策的灵活性,加剧以色列同其他国家的民意对抗,使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陷于外交被动。以色列与敌方形成针锋相对的安全观,导致巴以冲突、阿以冲突、伊以冲突以叙事冲突的方式自我延续。基于这些叙事,以色列常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用民族主义来解释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行为,另一方面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从而无限扩大反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以色列与整个世界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对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外界越来越难以理解以色列的例外主义和霸权主义逻辑,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人比例从 2023 年 11 月的 50% 下降到 2024 年 3 月的 36%。^① 同样,英国国际调查公司 YouGov 2024 年 10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50% 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缺乏正当理由”,超过三分之二的曾支持以色列

^① Jeffrey Jones, “Majority in U. S. Now Disapprove of Israeli Action in Gaza,” <https://news.gallup.com/poll/642695/majority-disapprove-israeli-action-gaza.aspx>.

发动加沙战争的欧洲受访者现已改变看法。^① 诚如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观点,以色列对地区局势的特殊认知不断为外部世界提供反以动能,悲观的共识最终可能建构出悲观的地区局势。

第二,安全事务被赋予最高优先级,导致以色列始终陷于安全困境。根据认知心理学中的诱发定势,人们常以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来解读外界信息。以色列人对安全事务的高度关注,极易导致其形成军事思维定势。首先,以色列领导人多拥有国防军服役经历,倾向于从军事安全角度思考问题,将战略问题进行战术化处理,缺少对战略全局的考虑和外交策略的运用。其次,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使以色列民众大多也拥有国防军服役经历,军旅生涯的社会化过程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右翼安全共识”。最后,以色列国防军强调“质量型军事优势”的技术主义路线定势,虽能在战术战役层面有效应对特定威胁,却无法彻底解除外部威胁。长期战争让以色列的军事科技越来越强大、“右翼安全共识”越发根深蒂固,却始终无法走出安全困境。

第三,由于“右翼安全共识”具有本土主义属性,以色列国家内部族群矛盾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在社会层面,犹太宗教人士的反阿情绪日趋强烈,将其对巴勒斯坦的仇恨投射于以色列阿拉伯人。2010年12月,萨法德大拉比施穆埃尔·埃利亚胡呼吁犹太人不要将房屋出租给阿拉伯人,导致当地民族矛盾加剧。在法律层面,以色列议会2018年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和2023年的司法改革方案,进一步凸显以色列国家属性中犹太性相对于民主性的优势地位,影响到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基础,加剧了国内原本存在的右翼与左翼、宗教与世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形成法里德·法扎利亚所言的“非自由民主”。^② 以色列不断强调恐怖主义和伊朗造成的生存性威胁,但这并无法消除社会内部矛盾,最终阻碍国家的正常发展。

第四,在“右翼安全共识”影响下形成的强硬政策,不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① Lemma Shehadi, “Support for Israel’s War on Gaza has Dropped in Europe, Poll Finds,” *The National*, November 5, 2024,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news/europe/2024/11/05/support-for-israels-war-on-gaza-has-dropped-in-europe-poll-finds/>.

②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76, 1997, p. 22.

首先,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频繁发动军事行动打破地区力量平衡,进而造成中东部分国家内部失衡。2024 年 12 月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就是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地区权力失衡导致特定国家内部局势突变的典型案例。这一动态可能在“抵抗轴心”成员所处的黎巴嫩、也门等国继续传导,加剧以色列周边环境的不稳定性。其次,动荡的地区局势最终为反以非国家行为体提供生存空间。以色列难以通过军事行动对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陷入维持威慑、威慑失效和重建威慑的动态循环中。最后,无论以色列军事如何强大,与周边国家在人口和体量上始终高度不对称。即便在“和解潮”之后,阿拉伯国家民众并未自下而上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未来不排除地区反以情绪以极端方式展现。

综上所述,“右翼安全共识”虽为以色列提供了短期安全保障,但长期影响却不容乐观,将产生反噬作用。从政策灵活性、内部族群矛盾和地区安全等方面看,“右翼安全共识”正在消耗以色列的国家资源与战略空间。近年来,以色列的反向移民趋势日益明显。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以色列民主的弱化等因素,大量以色列人选择暂时或长久离开这个国家。市场研究顾问机构凯度洞察与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在过去一年考虑过反向移民。^① 这一现象是“右翼安全共识”所催生的安全困境的直接体现。

六、结 语

“右翼安全共识”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以色列当下安全政策和行为模式的认知,避免将其简单归因于特定政治家、政党或外部安全因素。“右翼安全共识”的内核为右翼安全观。相对于工党时期的安全观,右翼安全观不仅更为强硬,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专制性和民粹性。进入 21 世纪后,以色列

^① “A Quarter of Israelis have Weighed Leaving the Country amid Ongoing War, Poll Finds,”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6,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a-quarter-of-israelis-have-weighed-leaving-the-country-amid-ongoing-war-poll-finds.

社会形成的包含形势认知和安全感知的“右翼安全共识”,既是外部现实因素的产物,体现了以色列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自我认知与政治诉求的变化,也深受历史传统文化、政党政治、舆论场域以及人口结构等内生因素的累积性影响。这些内部因素在以色列评估和选择外交政策和对内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中介变量的作用,是以色列在外部刺激下形成“右翼安全共识”的传导环节。同时,由于以色列社会高度分裂,因此强调外部威胁和宣传犹太民族主义思想,是维持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动员力的有效策略,“右翼安全共识”是这一策略的客观结果。总之,“右翼安全共识”的影响力随外部威胁增大而强化,安全局势缓和时在内部因素作用下维持,最终在以色列社会取得主导性地位。

短期内,“右翼安全共识”发挥了积极效应,提高了以色列的社会凝聚力,降低了国内的恐怖袭击频次,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等国家和组织有一定威慑作用。但长远看,以色列“右翼安全共识”为巴以冲突长期提供动能,进而加大了国内资源的消耗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①对于以色列这一“角色性”小国而言,合理运用资源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新一轮巴以冲突再次证明,“右翼安全共识”不但未能使以色列走出“威慑失效”循环,也不利于以色列朝正常国家方向发展。左翼安全观,尤其是以色列工党执政时期本-古里安的战略防御方针和摩西·夏里特的阿以和平理念,或许更具有战略前瞻性。

① 张文木:《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军事文摘》2015年第9期,第2页。